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

金一虹

内容提要 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实行鼓励妇女就业的国家政策,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支持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初步建立起公共的托幼系统。中国社会转型,极大改变了妇女在社会劳动和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单位福利制度解体直接导致了公共托幼系统瓦解,育儿变成了纯属私人的事情,而私人化了的育儿事业又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使“工作母亲”的母亲身份被排斥、被视为次等劳动。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重新塑造着母亲角色,整个文化观念向传统角色定位回摆,今天的母亲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新的压力使工作母亲面临的选择极具张力。

关键词 工作母亲 社会转型 好妈妈形塑

“工作母亲”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工作母亲”,顾名思义,即兼“有职”和母亲身份的职业妇女。

“工作母亲”在本文并不泛指所有有职业的母亲,主要指家有低龄幼儿、正处在育儿责任繁重阶段的职业妇女。与“工作母亲”相对应的是“全职母亲”,指不从事有酬工作、全天候尽母职的妇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鼓励妇女就业和实行连续就业模式的制度环境下,中国妇女具有高劳动参与率,因此也产生了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1978年时,中国有女职工3128万,以同年城镇初婚率0.772计,^①中国职业母亲应该不低于2000万,这还没有把农林牧渔劳动者算在内。

用国际劳工的概念范畴,她们可以归入“有家庭责任的员工”。但是,当她/他们对家庭的照顾性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的时候,极易遭受雇用单位和雇主的排斥。由于在中国家庭领域内

大多数家庭延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因此“家庭责任”的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特别是已为人母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有家庭责任员工”遇到的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工作的母亲身上。

“工作母亲”和传统没有工作的母亲不同,在公共领域她们体现了男女平等参与生产活动的方向,但在家庭领域仍要成为无偿的照顾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处于新旧两种性别角色体系交集之中。工作母亲的际遇以及她们的选择困境研究,往往是观察分析照顾劳动与性别平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女性主义学界通过对社会转型与妇女角色重塑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剧了妇女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冲突。^②社会转型带来女性角色的重构,包括有工作的母亲。因此,我们需要将工作母亲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分析研究,这一转型给她们带来

了什么？

本文采用文献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代划分为两部分:1949-1990年、1990年以后两个时期的“工作母亲”^③,她们境遇和价值观。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该时期为母亲者,也包括她们的子女对母亲的观察与叙述,重点放在“90后”。共收集53例工作母亲的个人自述,和16篇“80后”“90后”学生所写的“工作母亲”的故事。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的“工作母亲”

1. “90前”的“工作母亲”

生育于1949-1990年间的“工作母亲”,可视为国家妇女解放话语形塑的结果。

尽管妇女劳动在中国一直作为蓄水池而存在^④,但“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就是参加社会劳动”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妇女解放理论,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这一时期基本的政策指向。即将为人母的女性也包括在其中。早在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公布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及学员时,就下文强调不准规定“不收孕妇”,在就业制度上为日后要做母亲的妇女提供了平等就业的保障。

这一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话语,不仅给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合法性,而且也成为妇女建构其政治身份的重要基础。有职妇女因参加社会劳动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身份,而“家庭妇女”(即现在的“全职太太”)则成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别名。如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所言“我们必须给劳动者……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⑤。虽然在这一时期“工作母亲”没有被赋予特别的意义,但在中国当时的政治逻辑下,既为母亲而继续工作则是一桩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同时,在劳动管理制度和福利政策方面也保障了妇女工作的不间断就业。“工作母亲”与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显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越性。

2. 公共幼托体系的建立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计划经济时代妇女极高的经济参与率是建立在公有幼儿园体系之

上的。^⑥

从1950年代始,国家就开始试图在全国逐步建立起一个惠及广大劳动者的公共托幼系统。

早在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政府就强调了“改造废除幼儿园招生的考试制,优先录取劳动人民和干部子女,将半日制逐渐改造成整日制,取消寒暑假制,以适应家长参加工作需要。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实行免费或减免收费待遇,接办一部分私立幼稚园,将之改为公立。”^⑦

1951年教育部拟定《幼儿园暂行规程》、《幼儿园暂行教育纲要》亦指出举办整日制、办寄宿制和季节性幼儿园以利于妇女参加工作。可以看到,1950年代初期发展幼托事业以及优先录取父母双方参加工作、家中无人照顾的幼儿入园、延长幼儿在园时间等政策,都是以有利于“工作母亲”更好工作为宗旨。而废除幼儿园招生考试制、优先录取劳动人民和干部子女以及家庭困难幼儿免费或减免收费等措施,则体现了惠及普通劳动妇女子女,减少等级差别的社会公平取向。在面向工农和发展幼教事业以鼓励支持妇女参加工作的方针下,20世纪下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幼教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是,在中国的公共托幼体系中,真正由教育部门提供的公立园是很有限的,大部分是由用人单位的企事业单位提供。部分街道也提供了托儿所和“哺乳室”。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度的供给——通过给企事业单位的强制性规定,以单位福利的形式提供育儿的公共服务的。^⑧因此,公共育儿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职能,也成为工会等群团组织的职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1950年起,工会协助行政部门在企业事业单位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逐渐形成制度。^⑨

单位提供幼托最大的好处是便利和价格低廉,特别是在大型企业,工作母亲从休完产假开始上班起,就可以把幼儿送到单位的哺乳室,从哺乳室到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子弟小学、中学,单位提供了一条龙服务,而不像正规幼儿园托儿所幼儿要到3岁以后才能入托。^⑩母亲可以带幼儿上班、工间哺乳和探望,下班后接孩子——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不绝对分离,这给“工作母亲”提供了工作与育儿柔性衔接的极大方便。幼托在单位制下

具有福利性质,其价格之低廉为单位全体成员能普遍享受。

中国从五四时代就有对“公育制”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初步呈现雏形。这一公共托儿体系建设的努力在大跃进期间曾经达到最高峰,那时“三天托儿化”、“一夜托儿化”、“试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鼓舞人心,各种类型的街道、工厂、农村幼儿园一齐上,以至1958年全国幼儿园一下比上一年增加了42.3倍。“急速膨胀”使得新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多数处于“看堆放羊”状态(当时报纸语)。这一局面在1961年后又因经济形势的急剧跌落发生了巨大逆转。随着经济的调整和工矿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精简,1961年幼儿园数量比1960年又骤然下降了13倍^⑪,前后起落如此之大堪称史无前例!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建立一个公共托幼体制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巨大历史成就。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实践的局限性——社会抚育儿童作为一项公共资源,一方面覆盖面有限(据1986年的一项统计,全国儿童入园率也仅23.9%)^⑫,另一方面是在分配上表现出较明显的差等——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体制内和体制外巨大差等。最优越的是在50年代曾实行的国家供给制的机构。

企事业单位办园,各个单位因为体制、规模差别在所提供的母亲儿童福利方面有较大的差别。往往是单位福利制度越完善,托儿条件越好,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但对那些就业于小单位、集体企业和分散就业劳动保障不足的女性而言,托儿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供给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构成一个公共福利的差等。至于农村的劳动母亲,则不包括在内。

3. 工作母亲:在公与私之间

公共托儿曾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尽管覆盖率不那么理想。但是“公育”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却因此而变得如此深入人心。

孩子在那个时代不被视为家庭私有,而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国家财富。孙维世在一篇大庆纪实中写到,一次油田领导视察家属队的工作,发现在一个简陋的临时托儿所里,保育员辛玉兰背着、抱着、哄着孩子们,自己的儿子却被丢在角落里哭。领导问她为什么?

她说“让他哭哭怕啥?别的小孩可不能哭,孩子的妈妈都上地了,看好一个孩子就是解放一个妈妈!”领导表扬了她的大公无私,但又让她也不要亏待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也是国家的孩子。”^⑬

国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托儿,目的是“解放”妈妈的生产力,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一份有关大跃进时省级机关幼儿园的回忆说:“……许多干部下乡办公社,或上山指导炼钢铁,把婴儿托进幼儿园,把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也送进幼儿园帮忙代管,从1岁到8岁,谓之‘一条龙教育’……家长都不回家,由幼儿园包干管到底。”^⑭

另一份纺织女工的访谈说到,需要加班的时候,妈妈们把孩子往厂长办公桌上一放,说“孩子交给你了,我们加班去了。”^⑮

但是,在那个时代,对“工作母亲”而言,工作和母亲角色,重点还落在工作之上,母亲的角色是隐而不见的。母亲的价值,只有在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养育者时才被提及。在工作之余——发生在家庭内的所有抚育劳动和由此带来的双重角色冲突,都被视为妇女自己的“特殊困难”要由私人加以克服。妇联也一再代表国家教育妇女,要过好“恋爱、婚姻和生育”的“三关”。过得好过不好这三个关口,是对女性能否保有国家利益至上、事业至上、工作至上的革命精神的考验。妇女如果迷恋小家庭,将被视为革命意志衰退。^⑯这种褒扬公领域(工作),贬抑私领域(家庭照顾)的教育,一方面贬低了妇女照顾劳动的价值,强化了工作与家庭的对立,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母亲对母亲角色的精神焦虑——“工作母亲”以工作获得的自我尊严、成就感,弥补了因传统母亲角色压力带来的负疚。(此外,中国的以亲属、邻里熟人、同事社会支持系统为缓解工作母亲工作与育儿的压力也起到很大作用)

这一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源于现代工业社会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在中国养育孩子究竟属于公领域还是私领域?宋少鹏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私领域是分离并相互对抗的公私分离型,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时代虽然也有公私领域的划分,却是一种将私嵌入公中之公私相嵌型结构。在公私相嵌的结构中,家庭

失去了基石性的作用,成为只是为了完成公共目标而起辅助性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⑮这一公私相嵌的结构虽然肯定了妇女生育的公共价值,但又使她因在家庭内的照顾性劳动而在生产领域中成为二等劳动力,成为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工作母亲”地位整体性跌落的一个伏笔。

生于90之后:体制转型期的“工作母亲”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一点没影响到她的工作。她是机关的打字员,在我还只能横着抱的时候(刚满3个月)就把我送进机关托儿所,工作中途她可以来看我、喂奶,需要加班的时候,她把我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在办公桌边加班。可是我的两个表姐在90年代生孩子,职业生涯却因此发生大逆转。一个表姐因为生孩子丢掉了工作。另一个原来做到厂长助理了,因为生孩子,回来职位给别人顶掉了。极为好强的她一怒之下辞了职,却好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现在轮到我了,大学毕业找工作一次次因为性别被拒,理由是,女孩子将来总要结婚生孩子的。也有单位表示可以考虑,但要我保证,几年之内不结婚、不生育。

(个案1 2004级毕业生季蕙)

身为“80后”的季蕙看到三代女性面临生儿育女命运差异是如此巨大。她称为三代人从代际来说应该是两代(她和表姐们应该属于同代人),但她的感觉从80到90到她大学毕业的00年代,在社会巨变下,每10年就是一代。

社会转型,“工作母亲”外部环境的巨变

在二十多年中,季蕙们所处的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乃至改变了“工作母亲”的环境?这些变化使她们境遇得到改善,还是更为不利?

始于1990年代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使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岗位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女性在其中占更高比例已是不争的事实。^⑯女性劳动者更容易失去岗位不仅仅是因为劳动能力的老化,新生的女大学生在就业时遭到更多排斥也表明,女性劳动力不受欢迎,是与她们承担的养育子女任务有关。市场需要的是可流动、随时可以加班的“没有家庭负担的”劳动力。

教育产业化虽然是1998年正式提出的,但是在此之前,幼托的市场化早已开始。正值单位福利制改革前夜的1980年代末,公共托幼体系首当

其冲。此时的政府一再强调:“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⑰“养育子女是儿童家长依照法律规定应尽的社会义务”,“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国家包起来”。继而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幼儿园要“以园养园”自我发展,走出“福利”误区,^⑱及至1990年代中国发文要求将幼托等福利机构从企业剥离,全部推向市场^⑲。甩包袱式的改革最终使公共育儿制全面瓦解。

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从行政计划配置转为市场配置,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工作母亲”的(包括“未来要生育”的候补妈妈)形成强力排斥,实行阶段性就业的政策设计尽管因遭到妇女群体的强烈抗拒而未能制度化,但妇女因生育退出或暂时退出工作已相当普遍,正因此季蕙这代人感到工作环境变得对工作母亲越来越不友好。单位福利制的终结、公共育儿体系的瓦解则直接损害了工作母亲的福利,加重了工作母亲的工作和家庭负担。

重构母亲角色:社会文化的转型

与制度转轨、劳动配置和学前教育的市场化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向,对母亲亲职的强化以及性别角色分工向传统的复归。

一方面,在进入人力资源竞争极为激烈的现代社会,父母对子女养育为主的职责也转变为“养”和“教育”并重,甚至以教育为重。而在传统男性中心的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势下,教育几乎顺理成章地与“母教”划了等号,“母不在于慈,在于教”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使得育儿成为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风险投资,早教、入园、择校,中国家庭每一环节都“输不起”,现代化话语泛滥、科学主义加消费主义的滥觞,中国人全体患上了育儿焦虑症,而这一焦虑症又直接变成“母亲的焦虑”。

1. 母亲神话的制造与母亲焦虑症

19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国有一个制造母亲神话的风潮。以王东华的《发现母亲》为集大成者,其主要观点有:

——母亲在育儿方面有着本能的优越。父亲对孩子的作用要在孩子长大后日显,因为父亲代表外在的世界。

——“没有哪一种教育比母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和永久”，“母亲是孩子的总设计师”，中国国运兴衰和母亲素质直接关联——就这样把母教与中国现代化工程、民族国家的命运勾连起来。

——“女人的名字叫母亲，母亲能顶半边天”^②。再次强调做母亲是女人的天职，女人和母亲之间可以画等号：

——人类的错误在于“让女性放弃育儿去从事她们不擅长的物质再生产。母亲放弃育儿主职再到社会上找活干。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中国现代社会最大问题在于整个女性被“女权运动”引错了方向，受了教育却丢掉了母性，和男性去竞争，破坏了传统。^③

令人惊诧的是一再教育妇女要“四自”的妇女团体，也把这种对女权运动的反动捧为圭臬^④，在男权话语面前反应迟钝。

母亲神话的背面是母亲焦虑，巨大的全民育儿焦虑转化为“母亲焦虑症”。几乎每一个有关养育、教育的问题，最终都是指向对“母亲”职责的拷问。在笔者对家有认知和行为障碍儿童的6个母亲的个案调查中，深深感受到“父亲缺席”和“指责母亲”已成为较普遍的逻辑。在网上妈妈社区中，常常表露出“好妈妈焦虑”，比如一个妈妈因孩子的体重身高不达标就发帖称“我不是好妈妈!!!”^⑤

“妈妈，喝奶不是问题，选奶才是问题”，——儿童广告也变相强化母亲职责。“我不是好妈妈”和“我要做好妈妈”的焦虑成为一个时代的症候群。

QW生了一对双胞胎后得了产后忧郁症，拒绝和人交流，体重轻了20多斤，牙烂了6颗。QW家境优越，工作轻松没压力，产后双方父母给她请了两个保姆。人们不解她忧郁什么？她说“那么的累！心累。她们谁也帮不了我，妈妈、婆婆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带孩子。丈夫也帮不了我忙，男人不会因为孩子出生生活就被打乱，而我的生活一下子打乱了，原来的人生和今后的一下子切成两半，从此要和这两个孩子相依为命，我无法想象要把她们抚育成人还要成才，还要有多远，我看不到哪里是个头……”（个案2，QW）

QW与其说是产后忧郁，莫若说是对未来的

育儿焦虑使然。正因为当下中国对育儿的期待是如此之高，对母亲职责的要求是如此苛刻，使不少年轻的女性视生育为畏途。

2. 谁来界定“好妈妈”？——形塑母亲的权威结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好母亲的权威话语来自国家，妇联代表国家教育妇女要过好生育关。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尽管妇联仍然紧紧抓牢“好母亲”的形塑和诠释权，如自1999年以来，各地妇联组织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母亲素质工程”“母亲学堂”等，评选“美丽妈妈”、寻找“漂亮妈妈”等活动，但是中国业已形成官方、市场和网络共同形塑的多元格局。

市场——诸多早教、优教、辅导机构构成强大的形塑母亲的力量，限于篇幅不在此论述。这里专门对网上妈妈社区形塑母亲的力量做一点简析。王甘等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摇篮网”进行为时2年的田野调查发现，早教论坛的网上母亲社区这一虚拟社区已成为女性，特别是母亲们的精神家园。表面上母亲社区为母亲和准母亲提供的是孕期和育儿知识，但从深层看是为她们提供了性别身份、母亲身份的认同，对母亲群体类别的归属，以及对母亲体验的分享和相互肯定和尊重。^⑥在这个网络社区，妈妈们会讨论诸如“做了妈妈后该不该去考研究生”“要不要把几个月的孩子留在北京，自己去海外办事处工作”“做个全职妈妈好不好”等问题。一位女白领经常被领导批评：你可是北大毕业的呀，可不能不思进取，为孩子放弃工作上的努力。她自己感到在单位灰溜溜的。可是和网上妈妈聚在一起，发现不思进取的人多了，她非常开心，说就像“地下党找到了组织”——母亲们在网络互动中，母亲角色、母亲的价值观念在被不断重构：

——在旧中国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做了母亲后，以孩子的名字称呼妇女是一种传统习俗，而今天网络社会中的精英职业女性却也乐于自称“某某妈”；

——形成以快乐/责任体验作为生育和育儿价值的内核。网友们认为，倾诉做母亲的辛苦是太“传统”的做法，她们强调新的母亲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强调做母亲是自主的选择，应该勇敢地承担责任，抱怨是没有风度的表现。亦有将母

亲身份浪漫化的倾向。

——挑战占主流地位的成就价值和工作价值观。如那位放弃海外发展留下来照顾幼子的母亲被网友们同声赞扬,面对社会压力,年轻女性非常欣赏自己的现代性和自主意识。一些妈妈认为“已婚妈妈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是回家相夫教子”,“女子相夫教子也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非低人一等,更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总体说来,网上言论显示母亲的群体意识伸张,今天的工作母亲更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母亲身份;但是她们也清醒意识到,目前社会对全职母亲的不利因素:缺乏使她们重返职场的机制,社会对全职妈妈有偏见、缺乏社会交往场所、个人经济地位得不到保障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妈妈社区中显现权威结构的变化。在摇篮网上常常有“请问我做的对吗?”的提问,谁是“好妈妈”的裁判者?上一代母亲因育儿知识的老化早已被判出局,书本知识有时也会受到质疑,而引用国外经验和海外妈妈的意见,往往被认为代表了现代性和科学性,而具有了权威性。有时在摇篮网上有没有“有宝宝家”也成了判断帖子权威性的一个指标。因为建宝宝主页是一件费工费时的事,因此,那些愿意投入时间精力来建立维护宝宝主页的妈妈,表明了她对孩子的重视,是个好母亲,容易赢得其他网友的信任。^{②7}

今日工作母亲:在两难之间

回首再看这改革开放3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看到工作母亲的劳动制度环境和文化参照系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巨,如此具有颠覆性。

——经历了社会转型单位福利制度解体的剧痛,公私相嵌型的结构被彻底改造成公私分离型的结构,育儿变成了纯属家庭、私人的事情,而私人化了的育儿事业又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

——中国劳动已经高度市场化,劳动者经过震荡、重组而被分层,“工作母亲”原来隐匿于“职业妇女”里面的“母亲”身份被凸显出来,并成为她被排斥、被视为次等劳动的主要因素。

——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的文化转型,重新塑造着为母之道,整个文化观念向传统角色定位回摆,甚至比传统更有过之——男主外女主内的

分工模式在今天意味着母亲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

值得探讨的是女性对这样一种向传统回归趋势的接受。在2012年另一大型育儿网站“宝宝树”对6758个网上妈妈的调查显示,宝宝58.0%主要由妈妈照顾,37.9%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而主要由爸爸照看的仅占1.95%。有82.4%的妈妈更倾向于由妈妈带孩子。把宝宝放在第一位,丈夫放在第二位的占56.15%,丈夫第一,宝宝第二的占18.9%,^{②8}没有一个妈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中国社会不仅存在阶层的分化,也存在性别的分层。两性差别化发展,使得一些职业女性不得接受并内化了母亲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养育子女之上的观念,因为通常丈夫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Y**的丈夫正处在最艰难的拼搏阶段,他作为一个非名牌大学出身的人要在周边都是名校精英的圈子里立住脚还要出人头地,拼得异常艰辛。家里的事他一概不管。他对妻子说:除了孩子生大病什么的,别的什么也别找我。妻子也在高校工作,也要评职称、晋升,对这样强加给她的抚育、教育全责她真的很不满。但让她忍受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想想自己再怎么拼也比不过老公,有前途。(个案3,Y**)

W**夫妇俩都在名牌高校工作,但是高校教师如果没有项目做,收入是很低的。她就不得不不停地做项目。但是男女差别还是很大的,女老师不容易有项目,她就不如老公项目多。她又很要强,争取出国进修了3年。三年后回来看到孩子心理问题很大,发展到拒绝上学,现在只能在家呆着。她感到很后悔,觉得孩子问题的责任全在自己。她始终没有说父亲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应负什么责任。(个案4,W**)

千帆过尽皆不是,今天中国的“好妈妈”已不再是能兼顾工作和家庭角色“工作母亲”,而是为了孩子能牺牲自我发展,全心全意投入育儿的全职妈妈。昔日工作母亲政治上的优越已不复存在,在某些阶层中(中产和中产以上),成为全职太太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象征。失去了往昔优越感的母亲,在“职业母亲”面前甚至感到前所

未有的压力——

一位孩子在名牌小学上学的母亲说,现在的教育对家长要求太高了,小学三年级的算术题我们就辅导不了了,我们只会设XY。还有班主任要小孩建博客,做网页,小孩哪会啊,还不是我们家长做。她感到没办法和全职太太比,“我做过调查,班上前6名除了一个真的是孩子本人聪明过人外,其他5个的妈妈都是全职太太。她们对教育特别专业,教育的方法也特别领先,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和她们比,我没那个时间和精力。我老公已经做到高层副总,他更不可能为孩子投放精力,我做到中层不容易我也不可能放弃工作,我只能多砸钱——我给孩子请最好的家教,请好几个,孩子的事就都交给她们了。”(个案5 Z** ,某大型国企的中层女干部)

但是在今日中国,成为全职太太并不能成为多数已婚女性的选择。今日一个在机关工作,家有小学生的母亲给我算,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不算赞助费、择校费,光是兴趣班、补习班每月要开支4.5-5千元,她说,“周围的人起码有一半是这样生活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个案6,机关干部LFQ)换言之,以今天的子女抚育成本之高,多数家庭还必须是夫妻共同工作挣钱的。当然,相当一部分女性拒绝作全职太太,并非家庭经济条件不够,而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专业和独立奋斗的人生追求。另一个让她们坚持职业生涯的力量是,她们深知一旦暂时退出,重返职场将非常之艰难。^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职业女性可能延迟结婚和生育、可能选择不婚不育,但多数人还会成为“工作母亲”,^③当然作一个“工作母亲”绝不是轻松的选择。

在一个孩子存在认知和行为障碍的培训机构中,因为孩子不能进入正常学校,相当一部分母亲是辞了职来陪孩子参加这样那样的培训班的。

“老公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外面的事不要你操心,你只需要对孩子负责。没管好孩子是你的责任。’我最后悔是生完孩子没有再工作。我学的专业现在很有发展,我的同学事业发展都很好。做一个母亲在家里地位实在低,”(个案7, H***) 因为儿子的智力问题, H 感到人生非常失败。她变得很暴力,孩子身上经常被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些全职母亲多数非常后悔辞去工作,

从此“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她们感叹,工作“不在挣钱多钱少,至少自己不会太落伍,有自己的成长空间。”

也有坚持不辞职的,如 C** :“我不忍心把孩子送到特殊学校,正常学校又进不去,我只能不停地给他求治、送这个那个机构去试验,非常累。但是带孩子不是最累的,和他爸爸一起带孩子才是最累的。他从来不管孩子,只会不停地抱怨、指责:你怎么生的孩子,这么笨!他总是制造麻烦,说你自己要送去的(培训班)你出钱!可我不能放弃,所以我不能辞职,为了孩子我也要工作,不然他的处境更差了。”(个案8, C**)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母亲”都因工作着而感到压力重重,作为一个高校教师的 ZYZ 认为因为职业素养使自己做母亲更有优势,“孩子班上是有几个全职妈妈的孩子,但学习都不好。说这些全职妈妈对教育很‘专业’?也不过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知半解的。我没感到和她们比有什么压力,关键是和孩子交流的质量,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然全职妈妈也有优势吧,比如,她们和老师关系处得好,虽然孩子成绩不好,还可以当班干,评三好。这种风气,唉……随她们吧。还有她们的信息多,参加什么班有用,什么地方有比赛什么的,知道得特别多。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为她们所左右。不过全职妈妈也有很好的,把搜集来的资料放到班级博客和大家分享,还是挺让我感动的。”(个案9, zyz)

让 ZYZ 感到紧张和不满的,不是产生于和全职妈妈的比较中,而是男性对育儿责任的逃避。在最艰苦的育儿阶段,丈夫的甩手曾让她几乎崩溃。不过她认为这一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一些较多接受平等意识的男性已经越来越多加入到教育孩子的活动中,丈夫也如此。今天“工作母亲”们的紧张和焦虑,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的必要张力。

所以,未来“工作母亲”处境的改善,一是寄希望于国家通过制定家庭政策以建立对职业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二是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倡导男女共同分担养育和教育之责的性别文化。☞

①②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239-330、120页。

- ②董晓媛《照顾劳动、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刘伯红、张永英、李亚妮《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看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加]董晓媛[英]沙林主编《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41、142-172页。
- ③一般划分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80年代为界,但大规模改革劳动用工和福利制度带来幼托事业的转折是在中国急剧市场化后的90年代以后。
- ④蓄水说参见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 ⑤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1页。
- ⑥参见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儿童看护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加]董晓媛[英]沙林主编《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191页。
- ⑦中共在实行供给制的军队中早就有公共托儿机构,如延安幼儿园。而国家幼儿园的公有化从1950年教育部协同妇联、内务部、接管美国等国在中国开办的幼稚园、孤儿院、育婴堂、慈幼院200余所始。同时还接办了一部分私立幼稚园,将之改为公立。参见金一虹《中国的幼托事业发展、妇女就业及工作母亲》,中田照子编著《國際比較働く父母の生活時間育児休業保育所》,御茶の水书房,2005.2.21,有关法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第14页。
- ⑧政府规定:“实行劳动保障的企业的女工人、女职工,计有4周岁以内的子女20人以上,工会基层委员会与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协商单独或联合其他企业设立托儿所(如尚未具备设立托儿所条件,而有哺乳婴儿5个以上时,需设立哺乳室)”摘自《劳动工资文件选编1963-1965》(工资福利部分)(内部文件),北京市劳动局编印,1973年。
- ⑨1956年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第12条规定,各单位尚无妇幼保护设备者,应逐步配合妇幼保护设备,如哺乳室、托儿所、妇女卫生室等。转引自申国良主编《工会女职工工作手册》,海洋出版社,1989年,第5页。
- ⑩1960年黑龙江省向全省推广哈尔滨市亚麻厂的“妇幼保教一条龙”经验。不到半年已有67个企业实现“一条龙”。参见姜束霞主编《黑龙江省志·妇联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228页。
- ⑪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⑫参见孙维世《大庆通讯,从职工家属闹革命的一些平凡事说起》,《红旗》1969年第12期。
- ⑬参见洪范《幼儿园老园长吴德华》,《金陵女儿》第二集(未公开发行),第308-309页。
- ⑭资料来自刘伯红对北京国棉二厂老工人访谈记录。
- ⑮参见罗琼1982年5月12日在全国妇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所做《一年来妇女工作概况》中所说“加强过好‘三关’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广大妇女的欢迎,收到良好效果。”
- ⑯宋少鹏《嵌入公中之私:1950年代中国关于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 ⑰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45个城市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占失业者总数的59%,高出男性18个百分点。数据来自杜凤莲、董晓媛《中国城镇失业人口持续时间的性别差异》,施国庆、柯兰君、金一虹、米夏埃拉·鲍尔主编《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2005年,第250页。
- ⑱参见国务院转发教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幼教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8年第18期。
- ⑲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50年》,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第391-413页。
- ⑳参见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部、卫生部印发《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国经贸企[1995]184号文件)(1995年5月2日)。
- ㉑王东华《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
- ㉒参见谭振飞、胡晓凡、王东华《王东华发现母亲》,《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 ㉓王东华2000年曾被全国妇联授予“助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其主编的《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系列丛书,被全国妇联指定为“世纪父母读书活动”用书。
- ㉔http://www.babytree.com/community/club201106/topic_2715567.html。
- ㉕参见杨宜音、王甘、陈午晴、王俊秀《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王甘《摇篮论坛:网上的母亲社区》,载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81、182-224页。
- ㉖王甘《摇篮论坛:网上的母亲社区》,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224页。
- ㉗资料转引自南京师范大学女性教育研究生张岱瑶作业《从母婴网络平台“宝宝树”去探析好妈妈的标准》2012.4.5,母婴社交网络平台宝宝树(Babytree.com),被美国CNN称它是:“专为孩子和父母打造的中国版Face book”。
- ㉘参见《重返职场有多难》,《北京青年报》2012年3月1日。
- ㉙据向阳职业生涯的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职业女性,都希望在生育后重返职场,但是她们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难题。参见《八成女性希望育后重返职场》,《北方网》2008年3月5日。

作者简介: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ginyihong@163.com 南京 210097
(责任编辑:毕素华)